

亲属称谓的演变及其文化动因

姚权贵

【摘要】 汉语亲属称谓,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语言文化现象。不同时期的亲属称谓,是当时社会的血缘关系、家庭组织形式和婚姻状况的深刻体现,对于社会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从古至今,亲属称谓的数量、体系、称法和写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才逐渐形成今天的亲属称谓系统。而这些历时演变,往往是社会发展、亲属制度、汉字形音义、方言俗用等众多文化因素共同促成的。

【关键词】 亲属称谓;演变;汉字;文化

【中图分类号】 K203 【文献标识码】 A 【文章编号】 1008-0139(2016)03-0046-5

汉语亲属称谓历史悠久,《礼记·大传》云:“四世而缌,服之穷也。五世袒免,杀同姓也。六世亲属竭矣。”^[1]可见在先秦时期,“亲属”已经是个常见的专有名词了。而《尔雅》、《释名》等书,更是专门开辟了《释亲》一章,把“亲属称谓”和其他社会名物放在一起加以阐释,体现出其作为社会基础文化的地位。随着后来亲属关系的越来越复杂,亲属称谓的名目也变得日趋繁富,成为不得不关注并深入研究的重要文化现象。我们认为,亲属称谓的历时演变,是社会、政治、历史、语言和方俗等一系列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一、社会演进与亲属称谓的发展

亲属称谓起源很早,《易经·序卦》中说:“有天地然后有万物,有万物然后有男女,有男女然后有

夫妇,有夫妇然后有父子,有父子然后有君臣。”^[2]其中的“男女”、“夫妇”、“父子”已经形成了最初的家庭关系,“夫妇”、“父子”是最初的亲属称谓。似乎家庭关系与社会是同时起源的,而且还是其他社会关系(如“君臣”)的基础。然而,在先史时期,最初的男女之间,没有什么禁例,这种“男女”、“夫妇”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婚姻关系。加上以女性为中心、群居、游猎的生活情形,“知其母而不知其父”的现象普遍存在,家庭及其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凌乱模糊的。社会的发展,尤其是社会组织开始形成之后,才逐渐为家庭关系带来了禁例和限制。

当婚姻、家庭关系得到确定之后,那些用来称呼它们的名称(即亲属称谓),才有了固定的对应。但这个认知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,《荀子·正名》

〔基金项目〕 贵州省优秀科技人才省长基金项目(项目编号:黔省专合字2011[42])部分成果。

〔作者简介〕 姚权贵,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博士研究生,福建 厦门 361005。

篇云：“名无固宜，约之以命，约定俗成谓之宜，异于约则谓之不宜。名无固实，约之以命实，约定俗成谓之实名。”^[3]和其他众多名物一样，亲属称谓的定性和制名，也必须经历“名实”的辩证过程。对于严格遵循“名正言顺”的古人来说，“约定俗成”的原则使用起来并不那么容易。尤其当社会组织和亲属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，原有的几个简单称谓已经无法满足表达的需要，古人就陷入两难的境地。如《礼记·大传》云：“同姓从宗，合族属。异姓主名治际会，名著而男女有别。其夫属乎父道者，妻皆母道也。其夫属乎子道者，妻皆妇道也。谓弟之妻为妇者，是嫂亦可谓之母乎？名者，人治之大者也，可无慎乎！”^[4]最基本的亲属关系建立了，如同姓为同一宗族、男夫为父、父之妻为母、父之子为子、子之妻为妇，是家庭成员之间稳固的“宗族

父与母 子与妇”的线性关系，他们的称谓就很好确定。但问题在于，“父之子”可能并非一人，而是有兄、弟、姊、妹之分，如果兄、弟又分别娶妻，就产生了新的家庭成员，那么原本固定在下线的称谓“子与妇”就不能完全对应上这些亲属关系了。只有通过创造新的称谓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因此《尔雅·释亲》：“女子谓兄之妻为嫂，弟之妻为妇。”^[5]就是变通的处理，在原来“子与妇”的位置上，就变成了“兄与嫂”与“弟与妇”两种关系，也就有了“嫂”、“妇”两种称谓。与此同时，由于兄弟同辈，“弟与妇”是不能放在“兄与嫂”的下线的，只能放在相互平行的位置，于是从他们的下一代开始，就有了“直系”与“旁系”的区分。此外，还有一些文化因素在左右人们的决定，如因为“长兄为父”，所以兄称“弟之妻为妇”可以如父称“子之妻为妇”一样，而反之，弟称“兄之妻为嫂”，是不是也可以如子称“父之妻为母”一样呢？这样“嫂”就可以作为“母”之称谓了。在为亲属称谓制名的过程中，这些疑问是存在的，而我们在历史文献中并没有找到这样的称法，说明古人的态度的确是很谨慎的。

以此类推，如果姊、妹又分别嫁人，则沟通了本族与外族的关系，不但产生了更多的亲属关系和成员，又增加了“内亲”与“外亲”的区别。同时，在“内

亲”系统中，“直系”与“旁系”之间，同父兄弟之间，他们的关系使用什么来称谓，如《尔雅·释亲》：“长妇谓稚妇为娣妇，娣妇谓长妇为姒妇。”^[6]这些表示“兄弟之妻”的称谓，后来统称为“妯娌”。总之，就是按照这种方式，原本单纯的线性关系，逐渐成立体多维的亲属称谓体系。

当然，这种简单的递增变化，只是对亲属称谓的演变模式作的理论总结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。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难以统一的，加上民族、地区之间的差异，同样的亲属关系使用的称谓可能千差万别，而同一个称谓词也可能表达着不同的亲属关系。比如《方言》卷六：“南楚瀑涯之间母谓之媪。”^[7]与通语的称法相区别，则方言用法就为母亲的称谓增加了一个词。这种“同名同实”的情况，在后来的典籍中就更多了。从文化的角度看，和其他名物一样，亲属称谓的发展演变也是复杂多样的。

而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，尤其是语言规范和文化统一工作的开展，人们才对亲属称谓有了进一步的认识，最典型的代表就是《尔雅·释亲》的编著。在《尔雅》一书“雅正”思想的指导下，《释亲》对亲属关系及其相对应的称谓作了明确的规范定义，这说明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，亲属关系及其称谓必须受到封建礼教、宗法制度的严格约束，这也是社会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。

二、文献记录与亲属称谓系统的变化

古代文化的保留与传承，主要依赖文献典籍的记录。一如《尔雅·释亲》的编写，对上古亲属称谓作了历史性的总结，同时建立了汉语亲属称谓的基本框架和体系。《尔雅》之后，历代出现了很多整理和研究亲属称谓的文献，其中流传下来且具有系统性的，要属汉末刘熙《释名·释亲属》、魏张揖《广雅·释亲》、清梁章钜《称谓录》和清郑珍《亲属记》等几种。如果以《尔雅》为起点，通过文献记录和相互对比，可以观察到古今亲属称谓系统的一系列变化。

《释名》虽然只收了60多条亲属称谓，但增加

了很多《尔雅》没有的内容。一是新增了一些《尔雅》没有的称谓,如“妾谓夫之嫡妻曰女君”、“夫之兄俗间曰兄章”^[8]“青徐人谓长妇曰植”、“姪娣曰媵”^[9]等,有些是根据方俗称谓补入的,说明在当时的方言中还使用着不少的亲属称谓,这在稍晚的《广雅》中得到了证实。二是《释名》注意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亲属称谓存在差异,如“天子之妃曰后”、“诸侯之妃曰夫人”、“卿之妃曰内子”、“大夫之妃曰命妇”、“士庶人曰妻”、“天子妾有媵”^[10]等,这说明亲属称谓是受社会制度约束的,有严格的等级区分。同时也可看出,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础,无论是贵族,还是庶民,其角色都是先参与到家庭关系中。三是增加了一些描绘家庭状况的词语,如“无妻曰鰥”、“无夫曰寡”、“无父曰孤”、“老而无子曰独”^[11]等,它们是由于家庭成员发生变化而产生的特殊现象,因此也属于亲属称谓的一部分。此外,《释名》已不再仅仅阐述亲属关系,而是对每个称谓作了详细的解释,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探索亲属称谓的来源。并且个别称谓表示的亲属关系已开始发生变化,如《尔雅》:“妻之姊妹同出为媵。”^[12]而《释名》:“母之姊妹曰媵。”^[13]后者已和今天的用法相同。对比发现,《释名》已不是单纯地汇释词语,而是提供了更多与亲属称谓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信息,试图呈现出亲属称谓的制度化特点。

而《广雅》本身就为“广”《尔雅》而作,因此其《释亲》篇对《尔雅》作了很多增广工作。首先是增收词条,包括方言使用和先秦以后新产生的亲属称谓,如“翁、公、叟、爸、爹、翁,父也”、“媼、妣、媪、嬖、嬖、媪、姐,母也”^[14]“姑谓之威”、“同门谓之壻”、“妻之父谓之父娣,妻之母谓之母娣”、“妻谓之媵”、“壻谓之倩”^[15]等,有些是采自于《方言》,有些则是首次出现,不少称谓一直通用到现在。其次,《广雅》延续《释名》的做法,对一些称谓作了释义,但与《释名》的解释又有差异。如《释名》:“父,甫也。母,冒也。”^[16]而《广雅》:“父,矩也。母,牧也。”^[17]《广雅》的训释是采用许慎《说文解字》的观点,认为这是“父”、“母”在

借作亲属称谓之前的本义。又如《释名》:“弟,第也。子,孳也。孫,遜也。”^[18]而《广雅》:“弟,悌也。子,孜也。孫,顺也。”^[19]虽然都是依声求义,但《广雅》的释义更为精确,且更注重亲属称谓的文化内涵,比如弟、第、悌三字相通,而儒家文化中“悌”强调的是“敬顺兄长”,称谓“弟”正是相对于“兄”而言,训“悌”就更为贴切。最后,很有特色的是,《广雅》还收录了数十条与女子妊娠、生育、哺乳相关的词语,如:“人一月而膏,二月而脂,三月而胎,四月而胞,五月而筋,六月而骨,七月而成,八月而动,九月而躁,十月而生。”^[20]以及人的身体器官类词语,如“首谓之头”、“颜、颞、颞,额也”、“目谓之眼”、“颞、颌、颈、脰,项也”^[21]等。把这些词语归到《释亲》,可能在张揖看来,人类最初的生育繁殖是家庭和亲属关系得以形成的关键,最早的亲属称谓“父”、“母”、“子”都起源于此。古人常言: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。”所以身体并非个人的,而是父母生育的,属于整个家庭,因此古人把对亲属的研究和对人体自身的研究放在了一起。不管怎样,从《广雅》提供的信息看,人们对亲属称谓的认识更加深刻,称谓词语的来源也越来越丰富,汉语亲属称谓系统与它的早期形态已大不一样。

到《称谓录》和《亲属记》,古代亲属称谓的收录已趋于完善。相比而言,虽然《称谓录》所收的称谓数量略多,但作为一部专书,《亲属记》对亲属称谓作了全面系统的考证工作,它归纳了上百种亲属关系,辑词达600余条,同时辑录了前代所有记录亲属称谓的典籍,其参考价值远远优于同类文献。对比《尔雅·释亲》与《亲属记》,可以发现很多显著的变化。首先是亲属称谓的数量大幅增长,从《释亲》的100余词到《亲属记》的600余词,显而易见。从时间层次看,根据《亲属记》所引用的文献,增加的称谓一是先秦典籍散见而《尔雅》失载的,二是《尔雅》之后新产生的,新生词以汉魏六朝时期的最多,唐宋时期其次,这反映了亲属称谓在中古时期的发展状况。其次是称谓体系的扩大,从《尔雅》到《广雅》,所记录的亲属关系不过二三种,而《亲属记》则有上百种之多。在每一类下面,

如：“父曰翁、曰公、曰叟、曰爸、曰蕃、曰爹、曰爺、曰尊老、曰莫贺、曰郎罢。歿曰考、曰皇考、曰显考、曰先公、曰先君、曰先子、曰亡考、曰先君子。在庙曰祢。”^[22]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上这种亲属关系使用过哪些称谓。而《亲属记》总结的这些亲属关系及其称谓名称，几乎包含了与亲属称谓相关的直旁系、内外亲、宗族、家庭、婚姻、辈分、尊卑、敬称、特殊称谓等全部内容。同时，那些在亲属制度中具有特定意义的称谓概念，如“族”、“从”、“祖”、“堂”、“表”等，也都一一作了阐释。此外，通过《亲属记》的考释，可以清楚地了解一个亲属称谓的源流变化，知道它是如何演变成今天的样子。从《尔雅》的首次汇总，到《亲属记》的最后总结，古代汉语亲属称谓系统已经全方位建立起来。

三、汉字的形、音、义对亲属称谓的影响

汉字本身就是中华文化的精髓，作为典型的文化名物，无论是嘴上呼的，还是书面写的，亲属称谓都与汉字密不可分。从语言的角度看，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，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一切事物，都需要用汉字来记录和表达。亲属称谓也不例外，一种亲属关系，选择哪个字来记录，社会才认同，才乐意去使用？这是亲属称谓形成的先决条件。只有当这个字的形、音、义与这种亲属关系完美对应，并为社会广泛认可，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称谓词语。因此，汉字是影响亲属称谓的产生和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。

最初的亲属称谓，并没有自己的专用字，而是借用其他领域所使用的某个汉字的形、义来表达。比如称谓“父”，在甲骨文、金文里面，都是象“手持石斧”之形，因此古文字学者认为：“父乃斧之初字。石器时代，男子持石斧以事操作，故孳乳为父母之父。”^[23]正如母系氏族“统称所有持‘且（锄）’的女人为姐（母辈）”^[24]一样，在父系氏族社会，把持斧的男人统称为父，才逐渐成为“父子之父”的专用字。而当“父”作为“父亲”称谓的正字地位确定后，人们就利用“父”这个形义符号，造出了更多表示“父亲”称谓的字，如后来通行的

“爸”、“爹”、“爺”等都是。汉字对亲属称谓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。

实际古人早就注意到了亲属称谓与汉字的渊源，比如刘熙《释名·释亲属》载云：“親，襪也，言相隱襪也。屬，續也，恩相連續也。父，甫也，始生己也。母，冒也，含生己也。高祖，高，皋也，最在上皋，韜諸下也。弟，第也，相次第而上也。子，孳也，相生蕃孳也。孫，遜也，遜遁在後生也。”^[25]观察其中的对应关系，親 襪、屬 續、父 甫、母 冒、高 皋、弟 第、子 孳、孫 遜，都是通过语音探求语源的方法。可以看出，《释名》用音同、音近、音转之字，来考察亲属称谓的词义及其来源，从而找到了亲属称谓及其用字之间的音义关系。尽管这种方法有很多缺陷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在亲属称谓定名之初，选择哪个字来记录，与汉字的语音有深刻的关系。而这正是文字学的“同音假借”规律在亲属称谓定名用字上的直接体现。

不仅如此，一个亲属称谓的发展演变过程，与汉字形、音、义的变化过程，往往是一致的。最好的例子就是“爸”字，《尔雅》、《释名》都还没有“爸”这个称谓，“爸”作为“父亲”称谓，最早明确记录的可能是《广雅·释亲》：“爸，父也。”而这个后来居上的“爸”字，却成了今天最常用的“父亲”称谓。从字形上看，“爸”是在声符“巴”上添加形义符号“父”产生的后起形声字，这是比较好理解的。但它的读音变化，就比较复杂了，中古时期，如《玉篇·父部》：“爸，蒲可切，父也。”^[26]按照今天的拼读，反切“蒲可”读作“p”。这个“爸”字的形体和读音，可能源自古代的蜀方言，《正字通·父部》“爸”字条云：“夷語稱老者為八八，或巴巴，後人因加父作爸字。蜀謂老為波。”^[27]可以证明，古音“巴”、“波”与“蒲可切”很接近，都源自“父”的重唇音。而现代汉语普通话“爸”的读音“bà”，则来源于中古吴方言，《集韵》去声禡韵必驾切：“爸，吴人呼父曰爸。”^[28]“必驾切”今读就是“bà”。由此可见，“爸”的造字之初，是为了记录方言中的“父亲”称谓，伴随着文字形、音、义的一系列演变，才逐渐渗透到通语领域，发展成为今天

通用的亲属称谓。

除此之外,汉字系统中字与字之间的相互竞争,也会对亲属称谓的地位产生影响。据《亲属记》所载,历史上的“母亲”称谓曾有数十种之多,^[29]其中不少称谓是按照方言声符加形义符号“女”创造的,但绝大多数都已被淘汰,如“嬖、孀、嬰、媵、媵、媵”之类皆是。很明显,这些字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,因此很难进入通语领域和正字系统,有些称谓一直局限在方言之中,有些短暂使用后很快消亡。只有那些通用度和认可率都很高的字,才能够流传下来,比如“母”、“娘”、“妈”之类。即便是同时流通的称谓,如“娘”和“妈”,它们的地位也是有差异的。“娘”本来是形容“少女之貌”的,而流俗与作“母亲”的“孀”相混使用,因此逐渐取代“孀”的地位,成为“母亲”的一种称谓。而“妈”则是直接源自“母”的转呼,创造的后起形声字,与“父 爸”的理据一样。现代汉语称谓系统中,“妈”已处于绝对优势地位。其他亲属称谓情况也是一样,如“姐姐”称谓,在汉语普通话中,“姊”基本上被“姐”淘汰了。“爹”虽然在北方方言中仍占据重要地位,但“爸”无论是在语言系统,

还是在亲属称谓系统,都已远远超过“爹”了。有些竞争过程可能与汉字的书写变异和习惯有关,比如“兄、弟之妻”相互称谓,《方言》卷十二作“筑媵”,^[30]而《广雅》作“媵媵”,^[31]“媵”与“筑”同音相借,因为汉字书写有偏旁类化的习惯,于是同为“女”旁的“媵媵”组合在一起,就很快得到社会的认可,并一直沿用至今。

显然,汉字对亲属称谓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,根据这些规律和线索,我们不但可以探求亲属称谓产生的条件和原因,还能找到它们的语言和文化源头,并对它们发展演变脉络有更为清晰的把握,对汉语亲属称谓的研究必须重视汉字所起的重要作用。

综上所述,我们主要从社会、文献和汉字三个角度,探讨了汉语亲属称谓及其发展演变的相关问题。虽然只选择分析了一些常用亲属称谓,但还是捕捉到很多普遍性规律,从而证明,亲属称谓的研究是可以与社会、民族、文化和语言等诸多学科相沟通的。汉语亲属称谓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,在动态化的文化视野下,还有不少问题值得做专门性研究,从而取得更多有现实意义的成果。

【参考文献】

- [1] [4] 杨天宇.礼记译注[M].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4.430,429-430.
- [2] 郭彧译注.周易[M].中华书局,2006.416.
- [3] 安小兰译注.荀子[M].中华书局,2007.247.
- [5] [6] [12] 徐朝华.尔雅今注[M].南开大学出版社,1987.161,159.
- [7] [30] 钱绎.方言笺疏[M].中华书局,1991.246,402.
- [8] [9] [10] [11] [13] [16] [18] [25] 刘熙.释名(丛书集成初编)[M].中华书局,1985.47-48,48-49,49,50,47,44,44,44.
- [14] [15] [17] [19] [20] [21] [31] 王念孙.广雅疏证[M].江苏古籍出版社,1984.199,201,200,200,202,202,199.
- [22] [29] 王锷,袁本良点校.郑珍集·小学·亲属记[M].贵州人民出版社,2002.1082,1087.
- [23] 郭沫若.甲骨文字研究[M].科学出版社,1982.140.
- [24] 祝家君.汉字谱[M].岳麓书社,2014.614.
- [26] 顾野王.玉篇[M].中国书店,1983.61.
- [27] 张自烈.正字通[M].中国工人出版社,1996.645.
- [28] 丁度.集韵[M].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.592.

(责任编辑 王怀成)